

•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

从《读史》看王安石的史学观

晁天义

〔摘要〕《读史》一诗以文学化的手段典型反映出王安石的史学观,但是只有结合该诗文本本身、王安石的政治主张与活动,以及王安石史学观对宋代史学发展的影响三个方面,才有可能对它作出准确的解读。就文本本身而言,《读史》从历史记忆、历史记载、历史评价、历史研究等多个角度对历史研究的可能性、必要性提出质疑,实质上等于否定了历史研究的价值。出于变法的现实需要,王安石主张“祖宗不足法”,并将历史及其经验的总结视为需要摒弃的消极因素。为了反对史学实践,王安石以“尊经卑史”(或云“荣经陋史”)的方式抑制“读史”与“治史”,客观上对北宋乃至北宋之后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产生负面作用。体现于《读史》等文本中的王安石史学思想,是其政治诉求在强大的历史意识传统和环境中的产物,因而体现出先扬后抑、似扬实抑的矛盾性特征。

〔关键词〕《读史》;王安石;史学观;尊经卑史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5)03-0120-07

中国人自先秦以来就一贯重视历史,强调遵循秉笔直书、惩恶劝善等一系列撰史原则,尽可能全面地记录历史过程,有效地保留史实,不断地总结经验,以求经世致用。受这一传统影响,史学不仅在中国古代诸学问中成绩斐然、格外发达,而且在世界学术之林中也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关于这点,自梁启超等人发表经典论断以来,学术界已经基本一致认可,毋庸再加置喙。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重视历史,尊崇史学是中国传统中的主流,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仍然时不时出现一些相反的看法。与西方向来具有悠久而根深蒂固的反历史思想传统有所不同,中国先秦时期仅有以商鞅、韩非等为代表的法家,与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类似倾向。至于秦汉之后,系统的反历史思想几乎在整个社会重视历史的洪流中销声匿迹,而只有“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变法革新”的北宋政治家、改革家王安石仍持有相当程度的反历史思想^①。王安石的反历史思想不仅典型体现了其历史观的特点,同时对北宋及其以后的史学发展造成了显著的影响,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史学发展的复杂性具有一定启迪意义。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读史》一诗为例对王安石的史学观略陈管见,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王安石一身宦海沉浮,曾在多首诗歌中表达了他的政治观、历史观。在王安石的众多咏史诗之中,有一首《读史》与他的其他著作如《读汉书》《读汉功臣表》《读后汉书》《读蜀志》《读唐书》《读开成事》等以史书或史实为主题者有所不同。具言之,《读史》一诗虽未涉及具体的史实或史料,然而却具有极强的思想性。正因如此,较之于王安石的其他论著,这首短诗反倒更能直接准确地表达出作者的

^① 反历史思想,即对历史进而对历史学的价值和意义持质疑、否定乃至反对态度的观念或主张。反历史思想在西方学术史上的表现最为典型。影响也最为深远,其主要表现有二,即所谓“非历史”与“超历史”。前者主张遗忘历史,后者主张关注和研究像哲学、艺术、宗教等那样具有一般性、永恒性的对象——而不是像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那样具有偶然性、具体性的事物。关于这点,可以参考尼采的如下论断:“我用‘非历史的’一词来指代那种能够遗忘、能够在自己周围划出有限视野的力量和艺术。我称之为‘超历史的’力量,它能够将目光从演变的进程上挪开,转向赋予存在一种永恒与稳定特性的事物——转向艺术和宗教……非历史的和超历史的东西是用来对付历史压制生活的自然解药,它们是治疗历史病的方法。”(弗里德里希·尼采著,陈涛、周辉荣译:《历史的用途和滥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29~131页)如所周知,尼采是典型的反历史思想的倡导者,他的目的是以“非历史的”和“超历史的”力量来“治疗历史病”,却正好为我们提炼出反历史思想的两种类型。鉴于“反历史思想”一词及其相关的两种类型对于我们理解和解释中国古代的类似观念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本文采用了这个概念。

历史观、史学观,其价值不可小觑,有待慎思明辨。这正是我们以此为例进行讨论的理由所在。《读史》云: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黜黜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①。

《读史》一诗思想深刻,脍炙人口,因而传播广泛,影响深远。不过长期以来,对于如何理解王安石《读史》一诗的主旨,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大体而言,其说有二。第一种看法认为王安石对历史学持肯定态度,作者试图通过这首诗表达对史学价值的肯定以及对理想史学研究的憧憬。比如有学者认为:“这首《读史》诗,反映了一个历经沧桑、似乎是‘参透’了历史和现实的风云人物心灵的流露。诗作者不仅对于‘功名’看得淡薄了,而且对于‘末俗’以及能够‘乱真’的社会现象也不感到奇怪了。由此联想到史书上所记载下来的人和事,不仅容易失‘真’,甚至有的是‘糟粕’,谈不上‘粹美’,更难以反映出人的精神。史书既不能充分反映贤者之意,也只是在史书上留下一点踪迹罢了。”^②论者认为,王安石的思想是对刘知幾等古代史学理论家史学观点的继承和发展。第二种看法认为王安石试图通过这首诗表达对史学研究目标的质疑,甚至对史学存在价值的否定。如严敏认为,王安石的这首《读史》诗反映了王安石的“怀疑主义的史学理论”,“这种对‘书写的历史’的怀疑态度与现代历史哲学对历史真实性的怀疑已相当接近”^③。

在笔者看来,试图从王安石的思想中抉发出类似于后现代主义的“怀疑主义的史学理论”的确让人难以苟同,但将《读史》一诗的主旨界定为刘知幾史学批判思想的继承,也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实际上,王安石《读史》一诗的确蕴含着作者独特的史学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代表一种中国传统中的反历史思想。阐释学的基本理论告诉我们,要真正理解一部作品,就不能脱离作者的日常实践及其主张。同样的,结合具体的作品和文本,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作为思想家、政治家等角色的作者所承担的各种社会活动的意义。《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的意思是既不能离开文本理解时代和作者,也不能离开时代理解文本和作者。毋庸置疑,所谓“知人论世”或“论世知人”,正类同于阐释学所倡导的“阐释学循环”的理论与方法。回到本文的主题,要对王安石的史学思想做出正确的解读,既不能离开对《读史》一诗文本的解读,也不能脱离中国学术传统中的种种历史思潮,更要结合王安石的毕生政治经历尤其是其政治主张。唯有在这种多维度的视阈中,才有可能接近一个相对真实的王安石史学观。职是之故,让我们先从《读史》一诗具体分析谈起。

一 “独守千秋纸上尘”的陋史形象

如前所述,《读史》一诗脍炙人口,思想内涵耐人寻味,以致经常被史家引为同道知己。然而在笔者看来,这首诗所要表达的真正主题,乃是对历史价值的质疑乃至否定。或者说,该诗四句以清晰的逻辑从“历史记忆—历史记载—历史评价—历史研究”层面表达了四层意思,从而得出关于历史学价值和必要性的否定性结论。

第一层,“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是说对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和事及其贡献、地位,谁能够给予准确的记载和中肯的评价呢?第二层,“当时黜黜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历史研究者远离特定的历史场景,然而历史镜头的拉长却未必有助于历史真实的反映,原因是对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误解,就连当事人也很难避免,更何况后来的史家只能在时过境迁的情况下去处理这些历史事实,难度可想而知。第三层,“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正因如此,史家记载中最多只能保留一些细枝末节,至于历史的真谛和精髓却难以由此得到真正的传承。第四层,“区区岂尽高贤

① 余建忠译著:《中国古代名诗词译赏》,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7页。

② 瞿林东:《诗与史思想意境的交融——王安石读史诗浅议》,《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第210~214页。

③ 严敏:《王安石历史哲学思想述论》,《南昌高专学报》2009年第1期,第7~9页。

意,独守千秋纸上尘”,这一句在第三句基础上进而针对史书的阅读者或研究者展开评论,是说由史书上的细枝末节只是得出皮相之见,岂能充分反映古代贤哲的深刻思想?至于那些历史的阅读者和研究者,就只能独自沉迷于史书所载的糟粕而空耗岁月了。

显而易见,虽然该诗以“读史”为题,然而与人们通常的预期并不相同,作者并没有通过自己的读史实践对史学的价值提出一个正面的、肯定性的结论,而是一个负面的、否定性的评价。或者说,王安石“读史”之后得出的结论具有反对历史研究的意味。全诗先褒后贬,似在强调历史记载、历史认知的重要性,然而马上笔锋一转,对历史记载和历史认知的可能性进行了否定。从这些起承转合中,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作者试图从历史中得到有效的经验教训,也不是对历史编纂、历史认识合理性的充分肯定,而是完全相反的主张。由此看来,王安石的《读史》一诗并非像有人所理解的那样继承了刘知幾等古代史学家史学批判的传统,而是走向了对史学价值的否定。王安石的这一做法,让我们不禁联想起19世纪德国哲学家对总结历史经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否定性结论。显而易见,这种主张与中国传统中的强调历史重要性的“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思想完全对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们的观点带有明显的反历史倾向^①。

人们或许认为,王安石的《读史》只是针对历史时期某些低水平的历史研究工作的批判,而并不代表对历史研究价值的否定。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可以作为佐证的是王安石在《答韶州张殿丞书》中通过对中国史学发展阶段一分为二的认识,对他之前的史学成绩几乎给予了全盘否定。王安石在这份书札中说道:

自三代之时,国各有史,而当时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职,不负其意。盖其所传,皆可考据。后既无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虽雄奇偶烈,道德满衍,不幸不为朝廷所称,辄不得见于史。而执笔者又杂出一时之贵人,观其在廷论议之时,人人得讲其然不,尚或以忠为邪,以异为同,诛当前而不慄,讪在后而不羞,苟以履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况阴挟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恶,疑可以贷褒,似可以附毁,往者不能讼当否,生者不得论曲直,赏罚谤誉,又不施其间,以彼其私,独安能无欺于冥昧之间邪?善既不能传,而传者又不可尽信如此^②。

与《读史》一诗遵循了大体相同的套路,王安石在这份信札中对“史”的评论也采取了先扬后抑、名扬实抑的手法。在王安石看来,古代史学可以截然划分为“三代之时”与三代之后两大阶段,三代之史是可信的历史,三代之后的历史则“善既不能传,而传者又不可尽信”,因而不合格的历史。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史学虽然源远流长,但真正发展成熟乃是在秦汉魏晋之后,而不是在他所理想的“三代之时”(那个时候的中国史学,还处于萌芽之中)。为了反对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和合法性,王安石遂以史官制度缺陷、史家道德卑下为由,将三代以下的历史记载、历史研究一律打入黑牢。

其说虽辩,但毕竟与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实际相去甚远,更不能说他继承了刘知幾等人优良的历史评论传统。史载“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③,信哉斯言!在某种意义上讲,王安石对古代史学的以上判断的确堪称颠覆传统,石破天惊,却难以令人信服!

二 “修先王之政”而“法其意”的政治诉求

王安石对历史学的否定,与他的政治主张、政治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为了改变宋初以来国家积贫积弱,民生凋敝的现状,变法成为王安石毕生政治生活的要务和重心。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早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就已经充分表露。在王安石看来,他所处的北宋时期,“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惻惻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原因在于“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正因如此,要改变国家积贫积弱、民生凋敝的现状,就需要将政治、经济的改革提上日程,具言之,就是“修先王之政”。然而,所谓“修先王之政”并不是简单教条地照搬古代圣王现成的治理经验,而是活学活用,即“法其意”。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认为:

^① 参见晁天义:《中西传统中的反历史思想》,《天津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第162~173页。

^② 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临川文钞》,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75页。

^③ 脱脱等:《宋史》卷三七《王安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541页。

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然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余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①。

在这里,王安石为了革除影响政治有序运行、经济正常发展的种种痼疾,以托古改制为策略提出“法先王之政”的目标,然而马上又强调这种效仿的本质在于取其精髓(“法其意”),而不是得其皮毛。原因在于时移世易,不可能用二帝三王时期的举措应对今日之问题,即“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余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②。

史载“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③,尽管上述王安石的主张在当时未得到仁宗皇帝的采纳,但其中的核心观念却成为此后他在神宗时期进行变法的主导思想。由这段论述不难看出,王安石对于历史事实、历史细节甚至历史经验,并不像传统史家那样怀有强烈的兴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对历史和史学非但不看重,相反还持有贬低的态度。质言之,历史及其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种“重负”,而以研究历史经验、“借古鉴今”为目标的历史学究竟有何价值,自然也是值得怀疑的。“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联系《读史》一诗的相关内容,可以看出这种对历史价值的质疑并非偶然之举,而是在他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活动中一以贯之的。明白了这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何以王安石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甚至发出过“祖宗不足法”的惊人言论,而采取“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的惊人之举^④。在他看来,“祖宗”也好,“老成人”也罢,都代表了历史的经验甚至守旧势力,他们既然是推陈出新的阻碍因素,自然连同史学一样都属于排斥或反对之列。

实际上,作为一名改革家的王安石对历史研究经验和历史持有质疑和反对态度,并非什么不可思议之事。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反对总结历史经验可以说是几乎所有中国古代具有改革意识的政治家、思想家的一贯主张,顺理成章地,中国古代所有具有改革意图的政治家、思想家几乎都对历史研究的价值和必要性予以否定。正因如此,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中国古代几乎所有重要的史学著作都出自儒家之手,而非法家之手。东周时期,以反对“法古”“循古”“慕往”为主旨的反历史思想开始在以法家为代表的变法者中频繁出现。《史记·商君列传》引卫鞅语云:“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⑤荀子、韩非子和李斯将反历史思想进一步理论化。至于守株待兔、刻舟求剑之类寓言对墨守历史经验、不知变通的讽刺,更是形象深刻,入木三分。《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李斯语云:“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以古非今者族。”^⑥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倡导反历史思想与持有某种历史观二者并不矛盾,而是可以同时呈现在一个认识主体上的两种观念。换言之,反对借鉴历史并不意味着对历史没有一套成体系的观点,因为二者所讨论的并不是同一回事。正因如此,法家思想家在历史观上倡导今胜于古(类似于进化史观),但同时否定历史借鉴的必要性。

相比而言,身为儒家的王安石虽然没有直接站到法家的行列、套用法家的术语,但他所提出的“法其意”“祖宗不足法”等主张,就其根本目标而言则与法家立场无异,即都是为了反对强大而顽固的守旧势力^⑦。就北宋时期的实际而言,司马光等空前重视“法古”“资治”,因而才造成当时史学发展的盛况。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以“法古”“资治”为宗旨的史学正是为了实践“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理念。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玩味:司马光既是宋代政治领域的重要保守派,也是《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著的主要编撰者。

①② 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临川先生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50页。

③④ 脱脱等:《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第10542、10551页。

⑤ 司马迁:《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29页。

⑥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4~255页。

⑦ 参见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71~92页。

在这里,适当地注意一下《读史》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准确地理解王安石的反历史思想。在王安石毕生的政治活动中,很多场合都处于矛盾之中,使得他的许多思想或隐而未发,或欲言又止,或言此及彼,其背后的深意需要读者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细细体味,方可推知一二。我们知道,历时19年之久,在政治上趋于保守的司马光于元丰七年(1084年)完成了皇皇巨著《资治通鉴》。而据姜汉林研究,王安石的《读史》一诗作于次年,也就是元丰八年。该年三月,神宗赵顼去世,旧党得势,新法渐废,王安石心中十分痛苦,这首《读史》就是在这种满怀忧愤的心境下写成的^①。搞清楚以上历史细节,似乎就不难推知引发《读史》关于史学种种不满之词的因素,恐怕就是《资治通鉴》的完成。再次得势的司马光既是自己的政敌,又是其学术观点上的异见者,更重要的是宋神宗对司马光的这部《资治通鉴》又曾给予高度肯定。面对这种矛盾,王安石只能以委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职是之故,《读史》一诗所描绘的“末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独守千秋纸上尘”的陋史形象所指为何,恐怕就不难推知了。事实上,关于王安石这种投鼠忌器的复杂心态,我们还可以从他关于“诋《春秋》为断烂朝报”,以及关于所谓“三不足”(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的辩解中窥得。关于这点,邓广铭先生已有细致深入的分析^②,此处不再赘述。

在政治生涯中,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关系由于立场原因,经历了一个由亲密到疏远的过程。然而为了变革,贬抑历史和史学成为王安石的必然倾向,这就使其居于进退失据的境地之中。清人钱大昕曾说:“章、蔡用事,祖述荆舒,屏弃《通鉴》为元祐学术,而十七史皆束之高阁矣!”^③经学、史学在中国古代天然地与现实政治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到了宋明时期,情形更盛,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总叙》所云:“盖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恩怨既结,得志则排挤于朝廷,不得志则以笔墨相报复。其中是非颠倒,颇亦荧听。”^④由此现实情况,我们就不难理解王安石何以在评论历史时要采用那种先扬后抑、似扬实抑的手法,也更能体会他在涉及历史问题时何以会时而果敢勇毅,时而犹豫不决的矛盾态度了。

三 “十七史皆束之高阁”的客观效果

从宋代学术发展的实际而言,王安石关于史学的主张对此后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抑制作用。我们知道,自四部分类兴起以来,经学、史学无论在学术传统还是现实社会中都具有几乎同等重要的位置。正因如此,经史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尤其是伯仲之分,成为长期争论不息的问题。尽管如此,经学与史学之间的区分也可谓泾渭分明、昭然可辨。质言之,经学是以思想的形式表达某种具有一般性、普遍性的意识形态,即如四库馆臣所云:“经禀圣裁,垂型万世……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⑤至于史学则不然,四库馆臣如是概括道:“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莫简于《春秋》,莫详于《左传》……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⑥这就是说,与经学不同,无论偏向于史学研究的哪种路径(撰述和考证),都离不开具体的历史事实(事迹),否则史家就无所施其术。

关于上述经学与史学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关系,如果借用19世纪以来试图为历史学“立法”的西方历史哲学家的话讲,就是经学关注“永远如此的东西”,史学关注“曾经如此的东西”^⑦。在某种意义上讲,对历史经验的重视意味着对传统的坚持或固守,就其极端的可能而言无疑代表着守旧或教条。在改革家看来,如果整个社会的风气都倾向于尊崇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那就势必成为阻碍改革的重要因素。正因如此,改革家往往要对历史及种种重视历史的行为和思想进行打压,以期为现实中的改革廓清道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王安石遂将经学与史学之间的差异加以夸大,进而置之于完全对立的境

① 姜汉林编著:《历代官怨诗赏析》,大连:大连出版社1996年版,第263页。

② 参见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第92~111页。

③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附录二·钱大昕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85页。

④⑤⑥ 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叙》,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3、611页。

⑦ 参见R. M. 伯恩思、H. R. 皮卡德著,张羽佳译:《历史哲学:从启蒙到后现代性》,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8页。

地。他的具体做法,就是推出所谓“尊经卑史”(或云“荣经陋史”)主张。清人钱大昕批评道:

自王安石以猖狂诡诞之学要君窃位,自造《三经新义》,驱海内而诵习之,甚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章、蔡用事,祖述荆舒,屏弃《通鉴》为元祐学术,而十七史皆束之高阁矣!嗣是道学诸儒,讲求心性,惧门弟子之泛滥无所归也,则有诋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又有谓读史令人心粗者。此特有为言之,而空疏浅薄者托以藉口,由是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彼之言曰: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①。

显而易见,为了达到“尊经卑史”“荣经陋史”的目的,王安石及其拥趸分别采取了破坏性和建设性两方面的举措。就其破坏性而言,一则,他们宣称“经精而史粗”“经正而史杂”,将史学予以污名化;二则,将具体的史学著作与政敌的意识形态联系起来,统统予以否定,即“甚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屏弃《通鉴》为元祐学术”;三则,公开反对“读史”“治史”,“有诋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又有谓读史令人心粗者”。就其建设性而言,则是积极鼓吹所谓“新学”,一方面从意识形态方面确立变法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进一步打压史学,取代史学一度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

王安石的一系列举措为现实社会中的变法清除障碍,摇旗助威,同时对史学在宋代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正如钱大昕所说:“空疏浅薄者托以藉口,由是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在王安石反历史思想的影响下,空疏之风日兴,实证之风渐衰,北宋后期的中国史学因此而步入一个发展的低谷期。由此可见,王安石关于史学的看法并不是偶然的、临时的,而是系统的、持久的。他的《读史》一诗虽然措辞力求委婉,但立场十分明确,结合他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和举措,就不难对其本质有一个更加准确而深刻的理解。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度,史学在中国的发达程度,历史意识在中国的丰富程度,在世界历史上都可谓独树一帜。陈寅恪先生云:“中国史学莫盛于宋。”^②到了宋代,传统的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得到进一步深化,中国史学进入一个发展的高峰期。在北宋时期十分盛行的“咏史”潮流中,王安石的不少关于历史或史学方面的作品(包括咏史诗、咏史词等)就因其深刻的思想性而引起不少文学家、思想家的关注。比如有的学者指出:“王安石的咏史诗,内容广泛,寓意深刻,可谓文学修养、政治主张、历史见识的结合体,近年受到人们较多的关注。”^③有的学者认为:“为了直接表述自己的思想,(王)安石写了大量的咏史诗,议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为以政治改革为理想的王安石既认识到不能‘谆谆海导’帝王,但又想这样去作,只能通过议史来讽今。”^④还有的学者指出:“作为北宋一代卓越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王安石在诗歌中擅长以史抒怀,以古讽今,将咏史怀古作为表达政治见解的方式之一,表现出政治家的真知灼见。王安石以咏史怀古议时政,义理精深,是其咏史诗的显著特色。”^⑤诚哉斯言!不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史学史的从业者对王安石的史学思想始终兴趣不大,甚至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史学史著作专门探讨王安石的史学思想。对历史和史学投入如此之多兴趣和精力的王安石,竟然没有在史学史上具有其一席之地。究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王安石虽然对历史和史学兴趣颇浓,但他的“读史”“咏史”归根结底折射出其反历史的史学观。如上所述,这种反历史的史学观不仅与其变法思想相一致,更重要的是从客观上对中国史学在宋代的发展起了解构或阻碍作用。这一点,应当是各种版本的中国史学史著作中几乎不约而同对王安石的史学思想不置一词的原因所在^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王安石对历史的价值提出了质疑乃至否定,但他的是非功过最终仍要接受历史的评判。有学者评论说,王安石从史官入手对历史记载持一种大胆的怀疑态度并由此产生对

①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附录二·钱大昕序》,第885页。

②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0页。

③ 瞿林东:《诗与史思想意境的交融——王安石读史诗浅议》,《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第210~214页。

④ 张白山:《王安石》,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主编:《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3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85页。

⑤ 李唐:《论王安石议政的咏史怀古诗》,《学术研究》2005年第7期,第163~166页。

⑥ 一个例外,似乎是瞿林东教授在谈到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时,曾指出:“王安石是继范仲淹之后的又一位改革家,他在推行变法之前的一份《上皇帝万言书》中,分析了当时种种社会矛盾,披露了他的重重忧虑。”(参见瞿林东:《瞿林东文集》第4卷《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82页)

于史学客观性的怀疑。这种思想作为一家之言对于史学理论的深化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遗憾的是,这种颇具原创力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健全的发展。相反,它很快便与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纠缠在一起,知识与权力水乳交融,成为新党实施新法的理论根据之一;并随之异化、变形为新党打击报复旧党的意识形态工具,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北宋后期史学的发展^①。在史学发达的社会传统和文化氛围中,几乎没有一个反历史思想的倡导者能如其所理想的那样自外于历史的制约和评价。反历史思想的阐发者试图以“咏史”“读史”的方式反对历史,但是他们最终却仍然逃脱不了历史的评价,这的确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通过对王安石《读史》一诗及其政治实践的分析认为王安石具有反历史的史学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王安石持批判态度,更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这位中国历史上伟大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成就和贡献的否定。关于王安石的成就与贡献,近代以来梁启超、邓广铭等先生已经作出了足以令人信服的阐释。我们认为,王安石的反历史思想无损于他作为一位政治家和文学家的伟大。实际上,历史人物贡献之是否卓越、人格之是否伟大,与他对历史学持何种态度没有任何关系。正因如此,本文的结论只能说明一点:即使在一个历史传统悠久、历史编纂发达,历史意识强烈的民族之中,史学本身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直线演进的,而是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多样性。这是今后的史学史研究应当予以注意的。

收稿日期 2024—10—02

作者晁天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北京,102488。

A Study of Wang Anshi's Historical View from "Reading History"

Chao Tianyi

Abstract: Wang Anshi's historical view is reflected in the poem "Reading History" (《读史》), but only by combining the text of the poem, Wang Anshi's political beliefs and activities, and the influence of his historical idea on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Song dynasty, can the poem be accurately interpreted. "Reading History" questions the pos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historical research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such as historical memory, historical records, historical evaluation,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essentially denying the valu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Due to the practical needs of reform, Wang Anshi advocated that "there was no need to learn from ancestors" ("祖宗不足法") and regarded the summary of history and its experience as a negative factor which needed to be abandoned. In order to oppose the practice of historiography, Wang Anshi suppressed "reading history" and "governing history" by "respecting classics and belittling history" ("尊经卑史") or "glorifying classics and belittling history" ("荣经陋史"), which objectively had a grea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even in ancient China. The historical thought of Wang Anshi reflected in texts such as "Reading History" is a product of his political demands fostered in a tradition and environment with strong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thus displaying the contradictory characteristics of first promoting and then suppressing, and seemingly promoting but actually suppressing.

Keywords: Reading History; Wang Anshi; Historical View; Respecting Classics and Belittling History

【责任编辑 李 恒】

^① 参见刘成国:《尊经卑史——王安石的史学思想与北宋后期史学命运》,《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106~112页。